文学伦理学批评视域下《三国演义》中曹操“疑心”的伦理分析

An Ethical Analysis of the “Suspiciousness” of Cao Cao in *Romance of the Three Kingdom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李宇耀（**Li Yuyao**） 许景城（**Xu Jingcheng**）

内容摘要：曹操的“疑心”是理解其伦理形象的关键。本文以文学伦理学批评中的伦理选择与伦理身份为理论依据，将《三国演义》前78回中曹操的108个疑心事件析为“行动之疑”“心理之疑”“身份之疑”三类，三者行动为显、心理为枢、身份为源。三类疑心随叙事进程的个体行动者、汉室代理人、守成权力者与准君主四个时期而变。行动之疑在各期占比大体稳定于26%-29%，是贯穿始终的暴力底色；心理之疑于汉室代理人时期达到顶峰，此后逐步回落；身份之疑占比随权力扩张而走高，至准君主时期跃至43.3%的峰值，为三类疑心中唯一不降反升者。“三类疑、四分期” 由此将历来笼统的曹操“疑心”还原为随伦理身份而变的动态过程，呈现出疑心与权力扩张之间的共变关系，为“伦理身份决定伦理选择”的命题提供一个文本案例。

关键词：《三国演义》；曹操；疑心；文学伦理学批评；伦理身份；斯芬克斯因子

作者简介：李宇耀，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英语语言文化学院未来人文实验室成员，主要研究方向为文本计算分析、人工智能领域应用；许景城，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英语语言文化学院未来人文实验室成员、阐释学研究院兼职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AI文学、翻译学、区域国别学。

Title: An Ethical Analysis of the “Suspiciousness” of Cao Cao in *Romance of the Three Kingdom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Abstract: Cao Cao’s “suspiciousness” (yixin) is a key to understanding his ethical image. Drawing on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s theory of ethical selection and concept of ethical identity, this paper classifies a total of 108 suspiciousness events of Cao Cao in the first seventy-eight chapters of *Romance of the Three Kingdoms* into three types—“suspiciousness in action,” “suspiciousness in mind,” and “suspiciousness in identity”—manifest in action, pivotal in mind, and rooted in

identity. The three types vary across the four periods demarcated by the narrative progression, in which Cao Cao figures successively as individual actor, agent of the Han court, holder of consolidating power, and quasi-sovereign. The proportion of suspiciousness in action remains largely stable between 26% and 29% in every period, constituting a persistent undercurrent of violence throughout; suspiciousness in mind peaks in the period when Cao Cao serves as agent of the Han court, and then gradually recedes; the proportion of suspiciousness in identity, by contrast, rises with the expansion of power, reaching a peak of 43.3% in the quasi-sovereign period—the only one of the three types that rises rather than falls at this stage. The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three types of suspiciousness and four periods" thus unravels the traditionally undifferentiated "suspicious nature" (duoyi) into a dynamic mechanism that varies with ethical identity, revealing a covariation between suspiciousness and the expansion of power and providing a textual case for the proposition that ethical identity determines ethical choice.

Keywords: *Romance of the Three Kingdoms*; Cao Cao; suspiciousness;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ethical identity; Sphinx factor

Authors: Li Yuyao is a fellow of the Humanities@Future Lab of the Faculty of English Language and Culture at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His research interests include computational analysis of texts and AI applications (Email: 200911844@gdufs.edu.cn). **Xu Jingcheng** (corresponding author) is a fellow of the Humanities@Future Lab of the Faculty of English Language and Culture, and an affiliated researcher of the Institute of Hermeneutics, at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Guangzhou 510420, China). His research interests revolve around AI literature,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country and area studies (Email: xjc396@gdufs.edu.cn).

引言

《三国演义》中的曹操是中国文学史上公认复杂的伦理形象之一。作者借许劭之口，称其为"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罗贯中 6），这一评价构成后世理解曹操形象的重要基础。在"能臣"与"奸雄"的两极评价中，曹操的"多疑"常被视作其性格结构中的突出特征。国外学者或强调其作为"诗人政治家"的矛盾性（Hsia 65），或视其为世代读者"又爱又恨"的复杂人物（Besio and Tung xviii），也有研究将其描述为"狡猾、残忍、冷血、不择手段"的典型恶棍（Wichmann-Walczak 113）。国内研究则更倾向于将曹操的多面性纳入"奸雄"评价体系[1]，认为其性格核心在于"奸"，并围绕"奸"展

1　参见 沈伯俊、谭良啸编：《三国演义大辞典》，北京：中华书局，2007 年，第 35 页。

开出多疑、残忍、权诈、雄才大略等多重特征[1]。毛宗岗甚至称其为“古今来奸雄中第一奇人”，以“忠”“顺”“宽”“义”的表象对照其“窃柄”“篡政”的实际行动（毛宗岗 J）。诸说虽维度各异，却都不同程度地指向曹操形象中的“多疑”问题。

现有研究对曹操的“多疑”有不少讨论，但尚未形成系统分析。早期研究曾通过曹操与司马懿多疑程度的比较，反证罗贯中“拥刘反曹”的叙事倾向[2]；后续研究试图将曹操的疑心理解为动态的心理递进过程，认为“多疑”推动其从被动防御走向主动清除，从义士变为“血腥的屠夫”[3]。还有研究在“多重性格”（赵瑞莲 126）、“多重悲剧”（张晓敏 30）框架下论及曹操多疑，认为是其性格结构的一个维度。但以上诸论均未能深入讨论其“疑”的不同类型及追问产生的原因。无论多疑还是疑心，既是用以表现人物的心理学术语，也是用以表现人物的伦理学术语。本文将疑心拓展为复合分析概念，不再将曹操的疑心简单归为先天性格缺陷，而是将其理解为在伦理身份与权力争夺中形成的复杂心理现象和伦理表现；进而以“疑心”为核心概念，借助 AI 计算工具，展开对曹操疑心的计算和伦理分析，以更深入、更科学地理解曹操这个人物。

一、研究设计与方法

本文以《三国演义》毛宗岗评改本为根据，采用数字人文方法对曹操的疑心事件作较为全面的处理。如图1所示，在对前78回文本进行预处理后，采用滑动窗口方法提取曹操事件集，分批输入大语言模型以识别疑心相关事件，并规范输出背景、行为、对象、疑心类型、结果与原文引文等字段；进而将事件归入行动之疑、心理之疑、身份之疑三种类型。三类的判定标准为：行动之疑，指疑心外化为可观察的身体暴力（杀戮、抓捕、处决、清洗、镇压等）事件；心理之疑，指主要发生在认知与言语表达层面，表现为言语试探、认知误判、焦虑转移而未直接输出暴力的事件；身份之疑，指疑心指向“信任对象、信任边界、背叛后果”这三个身份参数，而非指向具体威胁行为的事件。原始识别的209件相关事件经人工抽样审读、去重、同类合并、边界截断等清洗处理，最终精简为108件疑心事件。清洗完成后，作者按以上三类判定标准对全部108个事件进行逐条复核；至于三类“疑心”之间边界模糊的事件，则依两条优先原则裁定归属：先看是否外化为可观察的身体暴力（若是，则归行动之疑），再看是否指向具体威胁行为而非身份参数（若否，则归身份之疑），以此降低归类分析的主观性。

1　参见 刘再复：《性格组合论》，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 年，第 494 页。

2　参见 王姝：“曹操与司马懿‘多疑’性格比较”，《辽宁教育学院学报》4（2000）：93。

3　参见 孙绍振：“另眼看曹操（一）——孙绍振演讲实录”，《名作欣赏》1（2009）：1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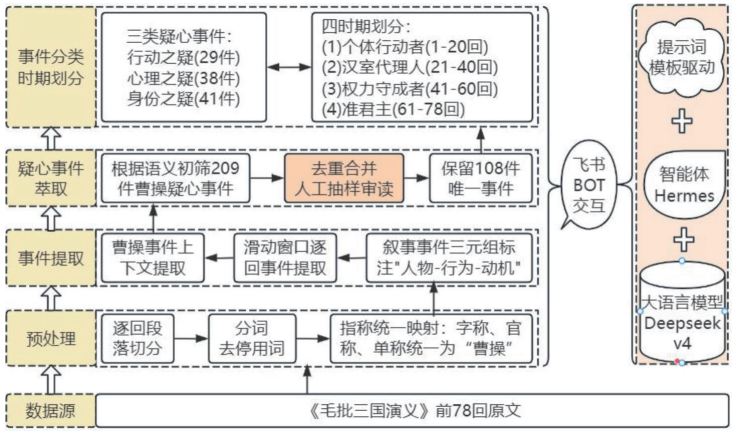


图 1　《三国演义》曹操“疑心”事件分析技术路线一览

除逐章计数与分类计量外，曹操伦理身份的变化为其疑心的形成过程提供了另一条考察路线。曹操的伦理身份同权势、名位与处境紧密联系在一起，并随其变化而变化，是分析曹操疑心的重要维度。例如，曹操的政治身份是他的重要伦理标识，但学界对曹操政治身份的界定却是零散的。许劭“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的二分法将曹操的政治品性定格于“能臣”与“奸雄”两端；《三国演义大辞典》的“曹操”词条，既以“奸雄”定其典型，又以“挟天子以令诸侯”明确勾勒其身份跃迁[1]。这些称谓与评点，大体勾勒出曹操由汉臣至权臣、由权臣至僭主的伦理身份转变的过程。但是，目前还无人将其连缀为可以分期的身份序列，也无人追问这一身份跃迁与曹操疑心的深化之间的关联。因此，本文将前 78 回按叙事进程相对均衡地划分为四个时期，再依各期核心特征归纳曹操政治身份的主要形态：1、个体行动者时期（第 1-20 回）；2、汉室代理人时期（第 21-40 回）；3、守成权力者时期（第 41-60 回）；4、准君主时期（第 61-78 回）。通过定量数据的统计，归纳曹操三类疑心与四个时期伦理身份转变之间的逻辑关系，并绘制四时期中疑心三类型各章分布密度图（如图 2）和曹操四期伦理身份与三类“疑心”事件数量对应示意图（如图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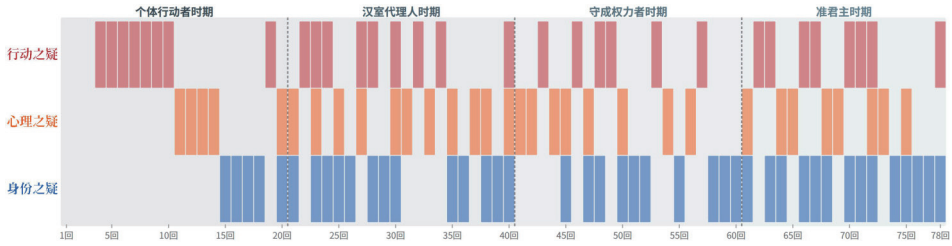


图 2　四时期中疑心三类型各章分布密度图

1　参见 沈伯俊、谭良啸编：《三国演义大辞典》，北京：中华书局，2007 年，第 35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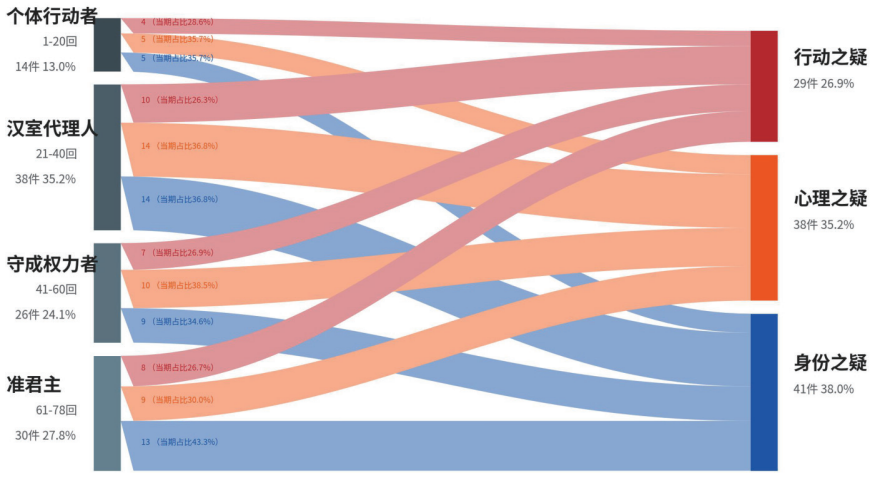


图 3　曹操四期伦理身份与三类“疑心”事件数量对应示意图

从这两幅图可知，曹操伦理身份的演变经历了一个由个体行动者到汉室代理人、再到守成权力者最终到准君主的发展过程。四期权柄渐重、名位渐隆，但疑心贯穿其中，成为其身份的重要标识。

二、兽性因子驱动的行动之疑

曹操的嗜杀与暴力，学界早有共识，但多止于静态的品性描摹与道德评判，或以“多疑嗜杀”并置其疑与杀[1]，又或揭其“由极疑变成极恶”的递进过程：曹操之疑并非迟疑，而是旋即出手的血腥果断[2]。此类观点虽已点出“疑”与“杀”的关联，却仍把“嗜杀”当作曹操一成不变的品性，或止于以“奸”“恶”笼统概论其人，既未将“杀”剖解还原为“疑”外化为暴力的结果，也未追问这一暴力外化如何随曹操权力形态的演进而变。

“行动之疑”不仅是曹操的一种伦理选择类型，也是由疑心导致的伦理选择的结果。疑心外化为可观察的身体暴力，其本质是斯芬克斯因子中兽性因子压倒人性因子抑或天性战胜人性而做出的非理性选择。根据文学伦理学批评的观点，兽性因子即人的动物性本能[3]，是人在自然进化和自然选择过程中的兽性残留，其表现形式为自然意志或自由意志[4]。兽性因子属人身上天性

1　参见 沈伯俊、谭良啸编：《三国演义大辞典》，北京：中华书局，2007 年，第 35 页。

2　参见 孙绍振：“另眼看曹操（一）——孙绍振演讲实录”，《名作欣赏》1（2009）：124。

3　参见 Nie Zhenzhao,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Sphinx Factor and Ethical Selection,” *Forum for World Literature Studies* 3 (2021): 388.

4　自然意志是动物性本能自发产生的表现形式，因此也是一种自由意志。参见 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年，第 275 页。

的一部分[1]，但并非等同于纯粹的兽性，因为动物身上的兽性不受理性控制，而人身上的兽性因子则始终处于人性因子的控制之下，人同兽的根本区别，正在于人能以理性意志制约自然意志或自由意志[2]。天性即兽性因子，人性即理性的人性因子。人性因子与兽性因子二者有别。人性因子是主导因子，兽性因子是从属因子，由人性因子约束和主导[3]。就曹操而言，其"行动之疑"体现了斯芬克斯因子的冲突，其导致的结果可视为曹操的兽性因子在特定伦理环境中对人性因子的一次次压倒。兽性因子是人的天性，只有当它挣脱人的理性意志的约束、直接外化为非理性意志时，才构成在自然意志驱动下的非理性选择后果。这正是曹操疑心外化为暴力行动的伦理根源。

29 件"行动之疑"事件分布于《三国演义》第 4 回至第 78 回（见图 2），贯穿曹操政治生涯的绝大部分阶段。其中典型事件包括第 19 回缢死吕布、第 20 回收监杨彪、第 23-24 回衣带诏清洗、第 40 回逮捕孔融全家、第 45 回斩蔡瑁张允、第 66 回乱棒打死伏皇后、第 72 回杀杨修、第 78 回华佗下狱等。这些事件在四个时期各有不同的特征。

第一时期（个体行动者）为生存暴力阶段。"行动之疑"主要源于生存威胁，是兽性因子在危机中的本能反应，第 4 回误杀吕伯奢一家则是典型例证。曹操作为通缉在逃人员，在无法确认真实意图的环境中，疑心超越心理评估阈值直接输出为暴力行动。此时兽性因子抑制人性因子，尚属个体层面的应激反应，暴力产生的动力来源于直接威胁者。

第二时期（汉室代理人）为制度暴力阶段。曹操获得"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制度性权力后，兽性因子借助权力机器得以放大，疑心的清除对象从直接威胁者扩展至所有潜在反对者。衣带诏清洗、杀董承等事件，使行动之疑由个体暴力上升为制度化的清洗。这个时期的行动之疑事件达 10 个，为四个时期中之最。

第三时期（守成权力者）为误判暴力阶段。赤壁一役，周瑜以反间、诈降设局，将胜负移入信疑之地，"行动之疑"遂密集爆发，如第 45 回误中反间计而斩蔡瑁张允、第 47 回因阚泽献降书而疑信摇摆。疑心在此已非制胜的警觉，而是被计谋利用的缺口，兽性因子借疑阵而外化。

第四时期（准君主）为内部清洗阶段。当曹操进爵魏王、逼近君位，"行动之疑"的暴力对象由战场之敌转为宫闱、臣僚、方士与医者，如第 66 回乱棒打死伏后、第 72 回杀杨修、第 78 回华佗下狱。兽性因子的暴力至此由外而内，指向曹操身侧最近的威胁。

循四时期而观，"行动之疑"的暴力性质经历了一个可辨识的演变：从

1　参见 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与人性概念的辨析"，《名作欣赏》19（2020）：10。

2　参见 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年，第 275 页。

3　参见 Nie Zhenzhao,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Sphinx Factor and Ethical Selection," *Forum for World Literature Studies* 3 (2021): 389.

生存暴力到制度暴力、再到误判暴力与内部清洗，各时期的“行动之疑”事件占比大体稳定在26%-29%之间（如图4）。以上源于兽性因子的暴力演变，可由两个典型事件进行定性剖析。

第4回中曹操误杀吕伯奢一家，是其兽性因子挣脱理性意志所导致的结果。曹操于通缉在逃之际寄宿吕伯奢家中，闻磨刀声而疑其图己，不待确证便“拔剑直入，不问男女，皆杀之”（罗贯中29）。此处的关键在于动机链条的断裂：磨刀声既可指向磨刀霍霍的谋害，也可指向磨刀宰猪以款待客人的善意，而曹操的兽性因子在信息缺失的高压环境中被自然意志直接触发，越过了人性因子所应承担的理性判断，将“可能”的威胁即时兑现为“已然”的杀戮。这个伦理选择行动揭示了兽性因子的作用机制，说明曹操并非缺乏分辨善恶的理性能力，而是当生存威胁逼近时，兽性因子的自由意志脱离理性意志完成了伦理选择。“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罗贯中29），这句自我辩护便是曹操伦理选择的逻辑前提。

第78回中华佗下狱事件则将兽性因子的作用从政治推向医学场域。曹操患头风，华佗进言以开颅取风涎治疗，曹操因疑心而大怒说：“汝要杀孤耶！”（罗贯中 583）毛宗岗以“能慕义者必恶恶”（罗贯中 581）加以解释，认定华佗慕关公之义、故必仇操，是一种对“义者复仇”的伦理行为。其实，曹操之疑的根源并不在于华佗的道德立场，而在于曹操将华佗预先归入“谋刺者”这一身份类别。曹操斥华佗“正与吉平无异”（罗贯中 583），是以既有的“逆臣”身份框架套用于华佗，使“借医行刺”成为无需求证的自明前提。华佗之死并非医患之间误会的个案，而是兽性因子在权力顶端对理性评估的全面覆盖：开颅之议纵有风险，以曹操的智谋本可多方求证，但他的理性已被身份焦虑解构，兽性因子借“借医行刺”之名完成了最后的置换。从此案例可知，兽性因子并非恒定不变的本能，其作用则随权力场域中伦理身份的转换而日益显著。

三、人性因子主导的心理之疑

“心理之疑”关涉疑心的认知与情感层面。学界对曹操“多疑”的认识，多聚焦其智性一面，或借曹操与司马懿“疑中见智”“疑中有异”之别，将“多疑”视为曹操性格中可资比较的智性特征[1]，又或者将其疑心概括为“多疑－不疑－自我迷信”的心理递进[2]。此类认识将“疑”当作静态的性格标签，既未将疑心的心理过程与暴力结果相区分，也未揭示“心理之疑”在疑心链条中的中介位置。疑心虽不直接输出暴力，却为暴力提供认知准备与情感动力。

“心理之疑”表现为疑心进入意识后的言语试探、认知误判与焦虑转移等内在过程。在斯芬克斯因子的运行过程中，它是人性因子与兽性因子在

1 参见 王姝：“曹操与司马懿‘多疑’性格比较”，《辽宁教育学院学报》4（2000）：93。

2 参见 孙绍振：“另眼看曹操（一）——孙绍振演讲实录”，《名作欣赏》1（2009）：120。

意识层面直接博弈的中介。人性因子是斯芬克斯因子中的高级因子和主导因子，对兽性因子具有控制和约束作用，是人进化拥有伦理意识和理性意志的标志；人性因子与人性二者有别：后者是人类有别于兽类的根本特质，而前者特指人类在野蛮演化至文明进程中所产生的并能指引自身演化为人的要素，其呈现形态为理性意志，其最显著特征便是善恶分辨的本领。[1] 学界对这一概念的理解，经历了从单纯强调“理性”到重视“理性意志与自由意志的博弈”的演进。[2] 就曹操而言，人性因子的作用不在于消除疑心，而在于为疑心配置理性通道。言语试探、认知误判与焦虑转移，正是人性因子在意识层面对兽性因子的猜忌进行“转译”与“驯化”。

38 件“心理之疑”事件分布于第 14 回至第 78 回，其中典型事件包括第 14 回询问董昭面色丰润的原由、第 20 回查看献帝赐董承锦袍玉带、第 21 回煮酒论英雄试探刘备、第 33 回询问谁曾入袁绍府门、第 68 回疑曹植乖巧不如曹丕诚心、第 78 回夜梦三马同槽等。循四时期而观，心理之疑以汉室代理人阶段为峰值，走出了一条先升后降的倒 U 形轨迹（如图 4）：由兽性警觉攀升至感性试探的峰值，经理性谋算逐期回落，终至焦虑转移，人性因子在认知中的参与亦随之由隐而显、复而趋隐。

第一时期（个体行动者）为兽性警觉阶段，“心理之疑”尚处本能层面，多由信息缺失触发，如第 16 回误判于禁造反、第 18 回拆看袁绍书信。此时认知的理性评估尚不充分，人性因子与兽性因子的博弈以兽性占据上风。

第二时期（汉室代理人）为感性试探阶段，也是心理之疑事件的爆发期（14 件，为四时期之最）。第 21 回煮酒论英雄中试探刘备之语，是言语试探的典型。曹操获得制度性权力后，身份边界模糊、伦理立场一时难以安放，身份焦虑化作密集的试探与盘问，人性因子的情感试探在其中占据主导。

第三时期（守成权力者）为理性谋算阶段。第 47 回与谋士商议是否相信甘宁、黄盖的投降、第 45 回询问蒋干与周瑜的交情，都体现认知博弈趋于复杂。此时人性因子的理性评估增强，曹操更倾向于通过多重信息验证来降低不确定性，“心理之疑”由本能警觉转向策略性的谋算。

第四时期（准君主）为焦虑转移阶段，第 78 回夜梦三马同槽、第 68 回疑曹植乖巧不如曹丕诚心，体现了权力传承焦虑向梦境与后嗣的渗透。此时“心理之疑”指向继承的不确定，人性因子的理性评估逐渐被晚年的权力焦虑所覆盖，焦虑经由梦境等潜意识形式表达。

以上四个时期勾勒了“心理之疑”由兽性警觉、经感性试探与理性谋算，终至焦虑转移的演变轨迹。这一轨迹在具体事件中如何展开，可由第 21 回煮酒论英雄一例见之。“今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罗贯中 153）表面上看是曹操英雄相惜的闲谈，实则是他精心设计的一次政治试探。曹操既认定刘

1　参见 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年，第 274 页

2　参见 吴笛：“‘斯芬克斯因子’ 溯源与阐释”，《外国文学研究》6（2022）：31。

备为潜在对手，因此在试探中权衡是否即刻剪除，这恰是“心理之疑”的探测逻辑。煮酒论英雄中曹操疑心的后果是曹操没有因刘备的机变释疑，而是将试探作为后续处置的依据，如第 21 回曹操遣刘备出征，实际上是将其逐出权力中枢。曹操的疑心说明，心理之疑不指向即刻的暴力，而指向对他人心理边界的探测与评估。

在曹操的疑心链条里，“心理之疑”是疑心的枢纽。一方面，它承接“身份之疑”所产生的结构性张力；另一方面，它又为“行动之疑”的暴力积聚情感能量。在疑心变化的逻辑中，“心理之疑”由兽性因子驱动，由理性谋算评估，再由焦虑转移，体现的是曹操从个体到制度至君位的身份跃迁过程。

四、伦理身份视域下的身份之疑

曹操的疑心源于心理，显于行动，身份是二者共同的伦理前提。疑心在认知层面如何权衡，在行动层面是否外化，皆取决于曹操居于何种身份位置。学界对曹操身份的讨论，多集中于为其定位，无论是“能臣－奸雄”二分法，还是“汉臣－权臣－僭主”身份转变论，所回应的均是曹操的身份定位问题，而无人追问其身份如何成为疑心的来源。实际上，“身份之疑”的疑心不指向具体威胁行为，而指向与“信任对象”“信任边界”“背叛后果”此三种身份变量相关联的事件，其本质是伦理身份自身结构性困境的显现。

文学伦理学批评认为伦理身份是人在社会中存在的标识，人需承担身份所赋予的责任与义务，同时也是道德行为及道德规范的前提[1]，而伦理问题的出现，也常常与伦理身份息息相关[2]。伦理身份每有转换，行动之疑、心理之疑与身份之疑三者的生成机制便随之改变，此时身份不再是外在的疑心标签，而是疑心产生的动力。伦理身份是伦理选择的结果，但它并非一成不变，而可通过伦理选择建构或解构[3]。就曹操而言，他由最初的个体行动者到汉室代理人，再到守成权力者并最终成为准君主，其伦理身份的转变体现的是一条不断叠加的关系网络。其每一次的身份跃迁，都重新定义了他与汉室、臣僚、家人之间的伦理关系，重新划定了疑心的对象与边界。

41 个“身份之疑”事件共同勾勒出曹操从身份确认到质疑合法性的危机路线，“身份之疑”背后是曹操伦理身份的结构性矛盾：“汉臣－权臣”与“父亲－君主”的双重伦理角色冲突。

第一时期（个体行动者）为身份确认阶段，表现为对身边之人的暗中刺探，如第 14 回派人探听杨奉韩暹动向、第 20 回密使人诬告杨彪交通袁术。此时曹操对他人身份的确认以刺探与搜查为主，信任边界的轮廓由此初现。

1　参见 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年，第 263-264 页。

2　参见 Nie Zhenzhao,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Sphinx Factor and Ethical Selection,” *Form for Worid Literature Studies* 3 (2021): 383-398.

3　参见 蒋文颖：“文学伦理学批评关键词：伦理身份”，《文学跨学科研究》4（2022）：625-629。

第二时期（汉室代理人）为“汉臣－权臣”撕裂阶段。曹操以汉臣之名行权臣之实，第 23 回“衣带诏”事发，他诈患头风以试吉平、审吉平以诱供主使，又将祢衡贬为鼓吏、借刘表之手除之。身份之疑由此集中于衣带诏牵出的反曹之人，名实之间的撕裂化为对反曹势力的清除。

第三时期（守成权力者）的“身份之疑”由内而外，曹操专注对外征伐，锋芒尽数指向敌方，将身份之疑用于对敌方的刺探与离间，如第 46 回派蔡和蔡中诈降东吴、第 59 回离间马超韩遂。

第四时期（准君主）疑心的方向随权力位置而转移，“身份之疑”折返向内。曹操进爵魏王、逼近君位，外敌之患退居其次，身侧之人的异心成为最切近的威胁，“身份之疑”遂重新指向宫闱与臣僚，如第 61 回逼死荀彧、第 72 回疑杨修与曹丕。

“身份之疑”如何具体化为曹操不同事件中的伦理身份，可由两个典型事件切入。第 61 回曹操借空食盒逼死荀彧，是荀彧的汉臣立场影响曹操建构新的身份所导致的。荀彧自起兵即追随、官至尚书令，为帐下第一谋臣，曹操明令杀之有损其“爱才”之名，如放任其心向汉室又恐其阻碍自己的身份跃迁。曹操不颁杀令，仅以空食盒示意令荀彧自裁，完成一次不沾血腥的政治清洗，体现的并非完全是毛评所说的曹操机心之“奸”，而是曹操的“身份之疑”。它既是对荀彧“汉臣”这一身份立场本身的警惕，更是对影响自己建构新身份障碍的清除。第 72 回对曹丕、曹植的测试，“身份之疑”表现为“父亲－君主”双重伦理身份的深层冲突。曹操晚年进爵魏王，继承人的选择既关乎父子亲情，更关乎魏国社稷，于是“父亲－君主”两种伦理身份在同一场景中相互撕扯。曹操通过出题考较二子才干的方式来遴选继承人，其中既有父亲考察儿子的用心，更有君主规避政权交接风险的算计，其本质仍是出于对杨修操控立嗣、欺瞒君主的猜忌。

曹操的身份之疑是在其身份建构与解构中形成的。在这一过程中，他身上的“才”与“奸”不可分割地共存于同一伦理主体，“才”与“奸”的侧重随伦理身份变化而此升彼降。“奸”的一面在汉室代理人阶段尤为突出，而“才”的一面是出于政治考量，体现在整个身份的建构中。伦理身份连续偏

表 1　曹操疑心事件三类型与四时期计数表

时期 / 类型	行动之疑		心理之疑		身份之疑		合计	时期占比
	事件数	当期占比	事件数	当期占比	事件数	当期占比		
个体行动者（1-20 回）	4	28.6%	5	35.7%	5	35.7%	14	13.0%
汉室代理人（21-40 回）	10	26.3%	14	36.8%	14	36.8%	38	35.2%
守成权力者（41-60 回）	7	26.9%	10	38.5%	9	34.6%	26	24.1%
准君主（61-78 回）	8	26.7%	9	30.0%	13	43.3%	30	27.8%
合计	29		38		41		108	100.0%
类型占比	26.9%		35.2%		38.0%		100.0%	

移的时序，为曹操的性格及其身份之疑提供了完整的观照。

表 1 是对三类疑心事件的统计，就四期的占比趋势而言，三类疑心的走向并不一致。如更为直观的图 4 所示，前三期的“身份之疑”事件当期占比值约为 35%，第四期则跃升至 43.3%，处于四期的顶峰。这些数据表明，曹操的伦理身份越向权力顶端攀升，疑心的来源越从“对具体行为的怀疑”“对他人动机的揣测”移向“对他人身份本身的质疑”，身份的建构也从“你是谁”转变为“你做了什么”“你想什么”的伦理选择，并在准君主阶段成为疑心的主要触发点。与之对照，“行动之疑”显示出曹操杀伐果断性格底色，“心理之疑”居间起伏，正是曹操疑心随权力扩张而深化的体现，“身份之疑”揭示“伦理身份决定伦理选择”，表现出曹操“位愈高、疑愈深”的政治野心。这也与美国生物学家萨波斯基在灵长类学中观察到的现象相呼应，在他看来，高等级首领须持续提防挑战者、守护地位，其“支配本身”即构成慢性压力（Sapolsky 435, 437-438），可见权力顶端的警觉并非文学叙事的专属想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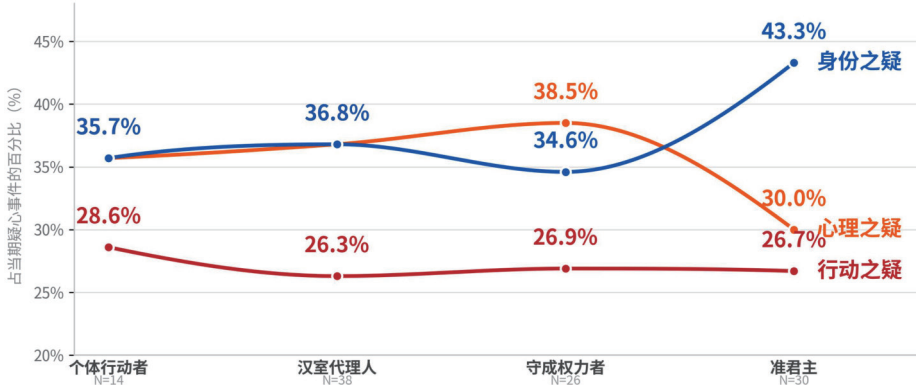


图 4　疑心三类型在四时期的当期占比趋势图

文学伦理学批评认为几乎所有的文学文本均记录了人类的伦理经验和伦理关系[1]，而《三国演义》便是这样一部详细记录了曹操疑心所产生的一系列伦理问题的经典文学作品。本文借助文学伦理学批评的斯芬克斯因子、自然选择、伦理选择、伦理身份等概念，融合定量与定性研究方法，系统梳理了《三国演义》前78回中曹操的108件疑心事件，并分为行动、心理、身份三类。研究发现：行动之疑是兽性因子挣脱理性意志后的暴力外化，其暴力性质随伦理身份的跃迁而由生存暴力到制度暴力、再到误判暴力与内部清洗，逐级攀升；心理之疑是人性因子与兽性因子在意识层面的此消彼长，其重心由兽性警觉经感性试探、理性谋算而终至焦虑转移；身份之疑则根植于

1　参见 Nie Zhenzhao,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A Basic Theory,” Forum for World Literature Studies 2 (2021): 191.

"汉臣-权臣""父亲-君主"等结构性矛盾，随身份攀升和权力扩张而愈益内化为对身份本身合法性的追问。三者并非彼此独立、相互割裂，而是呈现出"行动为显、心理为枢、身份为源"的辩证统一过程：疑心因身份而生、经心理权衡、落于行动，行动的结果又反过来重塑身份，如此循环往复。此三类疑的上述演变，共同展现了疑心与权力扩张之间的共变关系。这为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中"伦理身份决定伦理选择"的论断提供了一个以量化统计与文本细读相互印证的案例。

Works Cited

Besio, Kimberly and Constantine Tung eds. *Three Kingdoms and Chinese Culture*. New York: State U of New York P, 2007.

Hsia, Chih-tsing. *The Classic Chinese Novel: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Hong Kong: The Chinese UP, 2015.

蒋文颖："文学伦理学批评关键词：伦理身份"，《文学跨学科研究》4（2022）：621-630。

[Jiang Wenying. "Keyword of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Ethical Identity."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of Literature* 4 (2022): 621-630.]

刘再复：《性格组合论》。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 年。

[Liu Zaifu. *A Study on the Composition of Character*. Hefei: Anhui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1999.]

罗贯中：《毛批三国演义》，毛宗岗评改本。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 年。

[Luo Guanzhong. *Romance of the Three Kingdoms*, annotated by Mao Zonggang, Tianjin: Tianjin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2006.]

毛宗岗："读三国志法"，《毛批三国演义》，罗贯中著，毛宗岗评改本。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 年，第 I-O 页。

[Mao Zonggang. "Discourse on Reading the Romance of the Three Kingdoms." *Romance of the Three Kingdoms*, written by Luo Guanzhong and annotated by Mao Zonggang. Tianjin: Tianjin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2006. I-O.]

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年。

[Nie Zhenzhao. *Introduction to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Beijing: Peking UP, 2014.]

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与人性概念的辨析"，《名作欣赏》19（2020）：5-11。

[Nie Zhenzhao. "Clarify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and the Concept of Human Nature." *Masterpieces Review* 19 (2020): 5-11.]

Nie Zhenzhao.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A Basic Theory." *Forum for World Literature Studies* 2 (2021): 189-207.

—.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Sphinx Factor and Ethical Selection." *Forum for World Literature Studies* 3 (2021): 383-398.

Sapolsky, Robert M. *Behave: The Biology of Humans at Our Best and Worst*. New York: Penguin Press,

2017.

沈伯俊、谭良啸编：《三国演义大辞典》。北京：中华书局，2007 年。

[Shen Bojun and Tan Liangxiao eds. *A Comprehensive Dictionary of Romance of the Three Kingdoms*.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07.]

孙绍振：“另眼看曹操（一）——孙绍振演讲实录”，《名作欣赏》1（2009）：120-128。

[Sun Shaozhen. “Another Look at Cao Cao I: A Study Based on Sun Shaozhen’s Speech.” *Masterpieces Review* 1 (2009): 120-128.]

王姝：“曹操与司马懿‘多疑’性格比较”，《辽宁教育学院学报》4（2000）：93-95。

[Wang Shu. “A Comparison of the ‘Suspicious’ Characters of Cao Cao and Sima Yi.” *Journal of Liaoning Educational Institute* 4 (2000): 93-95.]

Wichmann-Walczak, Elizabeth. “Three Kingdoms at the Dawn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The Shanghai Jingju Company’s *Cao Cao and Yang Xiu*.” *Three Kingdoms and Chinese Culture*, edited by Kimberly Besio and Constantine Tung. New York: State U of New York P, 2007. 111-122.

吴笛：“‘斯芬克斯因子’ 溯源与阐释”，《外国文学研究》6（2022）：26-36。

[Wu Di. “The Origins and Interpretations of the ‘Sphinx Factors’.”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6 (2022): 26-36.]

张晓敏：“《三国演义》中曹操的多重悲剧及其悲剧精神”，《陇东学院学报》3（2026）：30-35。

[Zhang Xiaomin. “Multiple Tragedies and Tragic Spirits of Cao Cao in *Romance of the Three Kingdoms*.” *Journal of Longdong University* 3 (2026): 30-35.]

赵瑞莲：“试论《三国演义》中曹操的多重性格”，《曲靖师范学院学报》2（2019）：126-128。

[Zhao Ruilian. “On Cao Cao’s Multiple Personalities in *Romance of the Three Kingdoms*.” *Journal of Qujing Normal University* 2 (2019): 126-128.]